

國際儒學研究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Studies

國際儒學聯合會 編

于建福 于述勝 主編

第二十六輯

中華文明蘊含的可供當今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借鑒的重要思想智慧 / 滕文生

試論古代中國的“良法善治” / 俞榮根

中國儒學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 張邕之

從文化心理結構看中國文化與拉美文化的差異與融合 / 方朝暉

西方文化沒落之際論中華文化復興對改善世風之作用 / [美國] 熊玠

亞洲價值觀：亞洲地區發展的共同資源 / [新加坡] 李焯然

國際儒學研究

International Confucian Studies

國際儒學聯合會 編

于建福 于述勝 主編

第二十六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儒学研究. 第二十六辑 / 于建福, 于述胜主编; 国际儒学联合会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 7 - 5075 - 5057 - 3

I. ①国… II. ①于… ②于… ③国… III. ①儒学—文集 IV. ①B222. 0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4601 号

国际儒学研究 (第二十六辑)

GUOJI RUXUE YANJIU (DI ERSHILIU JI)

主 编: 于建福 于述胜

责任编辑: 刘超平 邹镇明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hs.com.cn>

投稿邮箱: hwch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 - 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 - 58336222

发行部 010 - 583362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75 - 5057 - 3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际儒学研究》编委会

主 任：滕文生

副 主 任：张学智 牛喜平

主 编：于建福 于述胜

委 员：牟钟鉴 张西平 赵毅武 郭齐勇

朱汉民 杨朝明 陈 来 曹凤泉

李存山 张 践 王念宁

董金裕（中国台湾） 刘国强（中国香港）

安乐哲（美国） 施寒微（德国）

李瑞智（澳大利亚） 梁承武（韩国）

土田健次郎（日本） 李焯然（新加坡）

卢基扬诺夫（俄罗斯）

执行编辑：杨雪翠

目 录

■ 会议致辞

中华文明蕴含的可供当今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借鉴的重要思想智慧

——在国际儒学论坛·利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滕文生(1)

■ 理论研究

修身立命: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 赵建功(13)

试论古代中国的“良法善治” 俞荣根(27)

孔孟感通哲学与全球伦理 [加拿大]梁燕城(35)

■ 儒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儒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张岂之(46)

“让”:儒家伦理中的分享与共同体建构 于春松(53)

中国儒家思想与“中拉命运共同体” 孙岩峰(60)

■ 儒学人本主义研究

儒家学说的道德信念和生死智慧 李存山(68)

儒学有神论思想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以天人关系为例 蒲创国(77)

儒家的人本主义与无神论 张 践(87)

■ 比较研究

论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关系 魏义霞(98)

从文化心理结构看中国文化与拉美文化的差异与融合 方朝晖(109)

■ 国外研究

- 西方文化没落之际论中华文化复兴对改善世风之作用 [美国]熊 玠(115)
- 亚洲价值观:亚洲地区发展的共同资源 [新加坡]李焯然(124)
- 中国文化资本的传播:中国经典与当代作品在印度的翻译 [印度]狄伯杰(133)

■ 会议综述

国际儒学论坛

- 德黑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志捷(143)

国际儒学论坛

- 科伦坡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雪翠(148)

中华文明蕴含的可供当今国家治理 和全球治理借鉴的重要思想智慧

——在国际儒学论坛·利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6年12月10日)

滕文生

今天，我们来到古印加文明的发祥地秘鲁，在著名的圣马丁德博莱斯大学会聚一堂，举行“中华文明与拉丁美洲文明对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件盛事。请允许我本人并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向承办本次会议的圣马丁德博莱斯大学、中华通惠总局，向积极促成此次会议并为其举行提供襄助和支持的阿兰·加西亚前总统、安东尼·陈校长、萧孝权主席，致以诚挚的谢意！向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各国学者朋友，表示热忱的欢迎！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下面，我想围绕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从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中拉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和中拉人民共同的历史命运与历史使命、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可供当今国家和全球治理借鉴的重要思想智慧等几个方面，作一个学术探讨性的个人发言，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概况

中国和拉丁美洲分处太平洋东、西两岸，虽然远隔重洋，但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却源远流长。从古至今，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6世纪中期以前。在这一漫长的阶段中，中拉文明的交流没有详细可据的文字记载，只能依据一些考古发现以及历史典籍的零星记载来加以考察，并做出一些推测。英国汉学家梅德赫斯特、法国汉学家迪涅、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莫里亚蒂、墨西哥学者基奇霍夫以及中国学者

章太炎、朱谦之等认为，中国和拉丁美洲属于人口同种、文化同源。学者们提出三种具体观点：一是大约在3万年前或者更早，亚洲蒙古人种的一个分支经由白令海峡的冰桥到达美洲，他们成为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二是公元前1000年前后，中国商朝的一支军队被周朝打败后曾乘船东渡到美洲；三是5世纪中后期，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僧人慧深曾东渡到过美洲。这些观点都还只是一些推测和猜想，还需要找寻到新的文献文物史料来印证。

第二阶段为16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期。这一阶段中拉文明的交流情况已经有了文字的具体记载，其交流的主要渠道就是跨越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可以说，这一阶段双方的物质文化交流，在中拉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1565年，西班牙航海家安德烈斯·德·乌达内塔带领船员开辟了一条从菲律宾的马尼拉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航道。1573年7月，即太平洋航道开辟8年之后，两艘载着中国货物的大帆船进行首航，经马尼拉于当年11月抵达阿卡普尔科。船上所载货物包括712匹中国丝绸、22300件中国瓷器。从此，借助这一航道，中拉经贸关系开始确立并逐渐兴盛起来。商人们从中国东南沿海把产自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漆器、火药、茶叶等装上大帆船，经过马尼拉中转，横跨太平洋运抵阿卡普尔科，再经过当地的集市贸易，一路乘船沿太平洋海岸南下运送到秘鲁、智利、阿根廷等地，再一路通过骡队从陆地北上运送到墨西哥城和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而拉丁美洲的白银作为商品贸易结算货币，以及产自拉美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向日葵、南瓜、花生、烟草等农产品，不断经过这条海上通道传播到中国。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从16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的大约250年间，每年都有几十艘大帆船，每艘船上装载几百箱甚至千余箱货物，往返于中国东南沿海—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这种商贸往来，对推动拉美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中拉之间商贸活动的开展，带来并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一些中国商人、工匠、水手和其他人员经由马尼拉来到墨西哥、秘鲁等地，或经商、或做工、或旅行。据有人估计，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中，移居拉美的中国人就有五六千人。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国的物质文化产品，还带来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元素和科学技术知识。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17世纪初，一位中国女子移居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城，她的中国服饰打扮，受到当地妇女的效仿，很快就在当地流行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服装风格，被称为“普埃布拉中国女装”；二是从16世纪末开始，随着来到秘鲁的华人工匠的增加，中国的烟花制作技术也很快传播开来，燃放烟花逐渐成为深受秘鲁人民喜爱的节日庆祝项目。

据统计，自1571年至1821年，从拉美运抵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比绍，其中约2亿比绍流入中国。据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统计，18世纪通过大帆船贸易，约有3000吨美洲白银经过马尼拉流入中国。这些白银不仅缓解了中国明清两朝的银两短缺问题，而且促成了中国市场由银锭到银圆的通货转化，促进了商品流通和货币的便捷结算，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至于由拉美传入中国的一些农作物品种，则改善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布局和粮食食品结构，有利于中国粮食产量的增加、农业的

发展和食品的丰富，有效缓解了当时中国由于人口激增而带来的粮食供应压力。

第三阶段为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拉美还是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拉美，摆脱外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爆发，许多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但是经济上仍处在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之下。随着黑奴贸易的衰落和废除，拉美的种植、采矿业迫切需要补充新的劳工。而中国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和西方列强的入侵，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殖民者在进行其他资源掠夺的同时，也将中国作为掠夺和贩卖廉价劳动力的最大市场。曾经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也变成了贩运华工的“苦力贸易”之路。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中期前往拉美的中国劳工就多达三四十万人。这些华工就像之前的黑奴一样，被卖到种植园和厂矿做工，受尽了屈辱和折磨。在华工和拉美国家人民的共同斗争下，1874年“苦力贸易”被废止，契约华工变成了自由劳动者。从此以后，广大华工和其他华人华侨，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同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道，致力于当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开发和建设，或者参与农作物的种植和加工，或者参与矿产的开采，或者参与运河的开凿和铁路的修筑，或者经营商业和手工业，或者把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传播和应用到当地，这些都说明，他们对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功不可没的。

随着中拉文明交流的发展和中拉友好合作的推进，中国的清朝政府与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开始逐步建立起外交关系。从1874年中国和秘鲁立约建交开始，到20世纪的头十年，巴西、墨西哥、巴拿马、古巴等相继同中国建交。中国辛亥革命后，1913年巴西、秘鲁率先承认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已经有13个拉美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和战乱频发之苦，社会动荡、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中拉经济贸易交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几近停滞。但是，中拉思想文化交流却展现出了新的内容，经过一些华人知识分子和拉美进步人士的介绍与传播，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为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和人民所了解，并深刻影响了当时正在开展的阿根廷、墨西哥、秘鲁、智利的大学改革运动。

第四阶段为1949年到现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受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以及美国对中国采取包围、遏制政策的影响，拉美一些国家没有能够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却一直受到拉美人民和有识之士的关注与支持。毛泽东主席的著作以及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书籍不断传播到拉美。特别是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畏强权、敢于斗争，坚决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以及通过各种形式坚定支持拉美国家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斗争，给拉美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拉美许多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智利、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秘鲁、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先后成立了促进同中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各种社会团体；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人士，如智利社会党前领导人阿连德、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哥伦比亚左翼革命党主席里卡多·安纳亚、秘鲁著名作家安东尼奥·阿尔塞、智利著名作家聂鲁达、巴西著名作家亚马多等，纷纷前往中国访问，推动了中拉民间友好往来。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社

会团体也不断派出各种经济、文化代表团访问拉美国家，受到受访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所有这些民间往来，都加深了中拉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胜利，不久就同中国建交。1970年智利同中国建交。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同中国建交，中拉文明交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同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已达21个。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为增进相互关系、为共同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展开的友好合作活动日益增多。2014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四国，并在巴西利亚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双方共同宣布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正式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把中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近，习近平主席又出席了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访问厄瓜多尔、秘鲁、智利三国，签署了多个双边合作文件，同时就携手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发出了倡议，为推动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现在，中拉经济文化交流正呈现出日益频繁和深化的可喜局面。在经贸往来方面：中拉贸易额节节攀升，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拉美已成为仅次于亚洲的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目的地，双方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农业、制造业、高技术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硕果累累。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已同多个拉美国家签订了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合作协定；自2006年2月拉美第一家孔子学院——墨西哥城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巴西、秘鲁、智利等国也都相继建立了多家孔子学院；2016年3月开启的“中拉文化交流年”，涉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近30个国家，目前已经举行了几十场文化交流活动，取得了增进互信和友谊的良好效果。可以说，一股新的“中国经济文化热”正在拉美大陆兴起。

回顾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我想起了中国的三句古语。一句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国和拉丁美洲相距万里之遥，但浩瀚的太平洋和世间的任何风云变化都阻止不了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进程。再一句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民友好始终是中拉关系持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中拉文明交流的历史，就是中拉人民彼此尊重、相亲相知、增进了解、发展友谊的历史。还有一句是“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不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每种文明和文化都会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也都会有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只有不断交流互鉴，才能各展其长、各补其短、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才能推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不断呈现出姹紫嫣红的多彩局面。

二、中拉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和中拉人民共同的历史命运与历史使命

中国古代形成的中华文明和拉美古代形成的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同古代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一起，构成了古代世界几大著名的文明形态，都曾对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和进步做出伟大的贡献。

中华文明在古代中国产生以后，就在东亚地区缔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同时对东南

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亚文化、西亚文化的演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中华文明所形成和积累的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思想智慧、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验，中国农业、工业、商业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而积累的巨大生产力，曾长达十几个世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1750年，在当时世界经济的总量中，中国占到32%，而欧洲的英国、法国、普鲁士、俄国、意大利五国总共才占到17%。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他的《大国雄心》一书中写道：“直到1800年之前，欧洲在市场化程度、农业发展、城市化比例、居民生活水平、经济总量方面都不如中国。”中华文明所创造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很早就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传播到非洲与欧洲。特别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实现全球航行以后，也即是在中国的明末清初，经过来到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学者、商人和其他人士的介绍与推动，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欧洲，曾经出现了长达一百年的“中国文化热”，将中华文化的西传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和新高度。而中华文明对欧洲文明的演进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的兴起，从思想文化和经济技术上所提供的重要条件甚至产生的奠基性影响，乃是举世皆知的。这一点，在欧洲和西方的不少学者和思想家、政治家中，也是有口皆碑的。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说：“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马克思曾经把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和应用，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预兆”。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在他撰写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英国自觉地获得和吸取了中国的技术——无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还是特定的技术知识。”“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有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中华文明对亚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发展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值得中国人民也是值得世界人民自豪和珍重的光荣。

以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为代表的拉美古代文明产生以后，不仅在拉美地区推动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如同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一样，也以其自身的长处与优势，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谱写了辉煌的篇章。拉美的多数地方处于热带地区，那里的先民们利用这种独特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创造出了富有热带特色的粮食生产和农业文明，培育出了玉米、马铃薯、红薯、西红柿、辣椒、烟草、可可等绚烂多彩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传播到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后，大大丰富了世界上的农作物和食品种类，促进了世界农业的进步和各国人民饮食结构的改善，可以说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立下了大功。拉美文明在数学、天文学、文字学方面，曾涌现出许多非凡的创造。拉美的印第安人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和使用“0”概念的民族，在公元前后就能用一个贝壳来表示“0”，其计数和运算方法独特而又简明高效。这一数学成就，早于世界其他地区几个世纪。拉美的先民们发明了远比欧洲同时代历法更为精确的历法。在建筑、雕刻、金属冶炼以及社会的组织管理方面，也产生了许多卓越的成就。拉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所做出的历史建树，同样是值得拉美人民也是值得世界人民自豪和珍重的光荣。

当世界历史进入十四五世纪以后，人类文明的演进开始发生重大的历史转折。经过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取得成功，资本主义文明陆续在欧洲各国建立起来并迅速发展。这标志着欧洲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工业文明代替了以往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农业文明，标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代替了落后的封建社会文明。这也标志着整个人类文明从此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发展的阶段，标志着欧洲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文明形态和发展形式上开始超越亚洲文明和东方文明而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关于欧洲和西方率先建立的资本主义文明对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所做出的历史贡献，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给予充分肯定。他们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然而，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要无限度地追求资本的增值，无限度地追求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资源产地的扩大，因此必然会不断地向全球进行扩张。从16世纪以后，欧洲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列强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即世界的南方地区，展开了持续几百年的武装侵略和殖民掠夺。在这样的国际政治大背景下，中国同拉美国家以及所有受到列强殖民侵略的国家的人民，空前广泛地站在同一政治战线上，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历史命运将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中国与拉美国家来说，这个共同的历史命运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和拉美国家在遭受列强侵略后，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丧失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受尽了欺凌和压迫。这种被殖民的屈辱遭遇，使中国和拉美人民深深地陷入了为什么自己的国家会沦落到如此悲惨境地的历史沉思。

第二，面对列强的劫掠与蹂躏，中拉人民从不甘于屈辱，而是团结奋起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涌现出许多前仆后继的爱国志士，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救亡图存的爱国篇章。这些英勇悲壮的斗争，彰显出了中拉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实现民族独立而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第三，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拉人民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得道多助的，而且彼此之间都是相互同情、相互声援、相互支持，共同为反对殖民主义而谱写出了壮丽的史诗。比如，在19世纪下半叶拉美人民掀起的反对殖民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斗争的高潮时期，许多来自中国的华工、华侨，英勇地献身其中，同拉美人民并肩战斗。1868—1878年间古巴爆发的一千多名华工的武装起义，以及后来华工、华侨参加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所领导的古巴第二次解放战争，就是突出的例证。这充分说明了居住在拉美的华工、华侨始终把拉美的独立解放事业视作自己的事业，并在所不惜地献出自己的力量以至生命。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广场上，今天仍然矗立着一座圆柱形纪念碑，上面铭刻着何塞·马蒂的战友贡萨洛将军的赞词：“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没有一个是叛徒！”同样，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斗争岁月里，拉美人民也给予了中国人民有力支持。秘鲁阿普拉党的创始人阿亚，就曾热情支持和赞颂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认为这一革命“削弱了外来的文化侵略，锤炼了中国的自身文化，从欧洲文化中吸取了必要的武器，以对抗威胁、摧毁中国文化的帝国主义”。哥斯达黎加的青年学生，也曾对1919年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寄予声援和期待。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中拉人民虽远隔太平洋，但在反抗列强殖民侵略的斗争

中，却始终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可见，共同投身于正义的斗争并相互支持，是没有时间和地理距离的。

第四，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和拉美国家人民终于获得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结束了殖民者在自己国土上的殖民统治。在长期斗争中，中拉人民都深刻认识到这样的历史真理：一是正义的事业必胜；二是正义事业的胜利来之不易，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才取得的，要十分珍惜和倍加维护；三是世界上正义与非正义的矛盾和斗争将长期存在而未有穷期。正因为中拉人民都认识并掌握了这样的真理，所以在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以后，又共同与亚洲、非洲所有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国家人民一道，继续进行反对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并共同提出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处理国际关系的正确准则，为维护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成果，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正义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得到半个多世纪的比较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同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主力军的中拉人民及所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密不可分的。总之，维护世界的和平与正义，是中拉人民及所有发展中国家人民现在和未来共同的国际政治使命。

第五，中拉人民从反侵略斗争中，深刻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道理。而这种落后，不仅是指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落后，更是指带有根本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政治治理机制的落后，而这样的落后会严重束缚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适合本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经济、政治的变革，来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这就是中拉人民及所有发展中国家人民在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后共同肩负的历史任务和发展使命。今天的中国和拉美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要最终完成这种任务和使命，还任重而道远。中拉人民应一如既往地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合作，为实现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发展使命，实现各国人民平等互利的共同繁荣、共同进步而树立典范。

三、中华文明所蕴含的可供当今国家和全球治理借鉴的重要思想智慧

当今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推动了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世界的经济技术面貌日新月异，人类文明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物质的丰富程度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另一方面，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影响，也产生了种种问题和不少弊端。在世界的发展格局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差距上的悬殊状态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仍未建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仍未实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殖民主义、新干涉主义依然存在；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危机不时发生，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悬殊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也在加剧；世界不少地区处于动荡之中，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乱象等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局部地区的冲突和战争不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发展还面临这样那样的危机。因此，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加强和改善全球的经济、政治治理，使之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呼声，成为当今时代的历史潮流。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得到沿线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战略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会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文化新局面，为缔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方案和经验。美国国际问题专家、现任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指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这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计划，说明中国正在做一个其他国家没有做过的事业：不是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其他国家的痛苦之上，而是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国共享繁荣。中国的举动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之一，它给人类带来巨大希望。

为了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实现世界上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的各国人民共同向往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理想，我们必须为加强和改善各自国家的治理，加强和改善全球经济、政治的治理而共同努力，使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星球和世界变得公正合理、光明美好。为此，我们必须借鉴各种历史文明与现实文明所积累的丰富多彩的思想智慧，充分发挥其在加强和改善当今国家和全球治理中的指导、启示与借鉴作用。我们这次在利马举行“中华文明与拉丁美洲文明对话”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其目的也在于此。下面，我想就中华文化中所蕴含的可供当今国家和全球治理借鉴的思想智慧，择其要者作一个简要的叙述，主要讲以下六点。

一是和而不同，有容乃大。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事物之间异同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都对这一思想做过精辟的阐述。比如，孔子之前一个叫史伯的人就说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则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也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些话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矛盾着的各个侧面构成的一个统一体，彼此既对立又统一，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从而产生出新的事物。如果组成事物的各个侧面，都是完全相同的，那就不会发生相互转化了，就永远是一个样子，不会有新的事物产生了。所以说，“和”与“同”是相异的，“和”不是绝对的同一，而是不同事物的“和”合相处。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而对立统一，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是人类历史、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辩证法。我们倡导和坚持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正是以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哲学基础的。

所谓有容乃大，是说如同大海之所以浩瀚是因为它能容纳无数江河细流一样，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只有善于学习和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分，才能不断发展进步而创造出辉煌的成就。无论哪一种文明，都是在流动、开放中得到传承和发展的，只有本着开放包容的态度，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养料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才能增强自己的生机与活力，才能持久地发扬光大。这是一切文明发展的规律。

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明特性不尽相同，但不同意味着多姿多彩，差异包含

着融通与统一。不同文明之间，只有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如果只是对自己的文明孤芳自赏，甚至奉为至高无上，而鄙视甚至打压别的文明，搞“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文明霸权，最终只能事与愿违，自己的文明也终将孤寂而衰亡。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建设，来促进不同国家的共同繁荣，建立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正是“和而不同，有容乃大”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二是独立自主，自强不息。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自己与他人、主观与客观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所谓“独立自主，自强不息”，是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选择理论指导、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实现民富国强的过程中，要坚持自尊自信、自己做主、自力更生、奋斗不息。当然，这并不是要拒绝他人和外部的支持、帮助与合作，而是说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点上。这样才能真正自主自强，而不会变成他人和外部力量的附庸。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正是在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思想精神鼓舞下，才能不断地实现和维护古代中国的统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才能不断地缔造近代以来中国的救国、兴国、强国大业。

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在一首诗中写道：“我热爱我小小的寒冷国家，哪怕是它的一条树根”，“我也要在那里生”，“我也要在那里死”。墨西哥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也曾说过，一个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根的民族是可悲的，正像没有母亲的孩子是孤独的。这两位拉美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和文句，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自己对于祖国真诚的热爱与自信，以及对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精神的尊崇与倡导。这也说明中拉人民的心是相通的，说明我们彼此都懂得独立自主、自强不息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思想精神，不仅在每个国家的发展和治理中要倡导和坚持，而且在全球的经济、政治治理中也要充分尊重和维护每个国家遵循这一思想精神来想问题、办事情的权利。

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道德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千古流传的嘉言懿行。意思是说，不要把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强加给别人，也不要把自己喜欢、信仰和追求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在处理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时，能够设身处地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多为对方着想，能够推己及人，能够既成己之得之利之美，亦成人之得之利之美。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末就被写入了法国的《人权宣言》，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它是“最纯粹的道德准则”，应该成为“所有人的座右铭”。这一思想还被国际社会誉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黄金法则”，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的墙上。

古往今来，那些信奉弱肉强食、阶级压迫、民族歧视、强权政治和种种霸权主义的人，却极力排斥这个道德金律，而施行“己所不欲，硬加于人”的逻辑。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许多事实都已证明，凡是违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金律而搞霸权主义的，其结果只能是害人又害己。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在当今的国家和全球治理中，应该广泛倡导和运用“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这一思想，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和人民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共进，以真正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四是同舟共济，和平共处。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讲求平等的政治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所谓同舟共济、和平共处，是说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不论贫富、大小、强弱，都应平等相待、互信互助、和睦相处，而不应以富欺贫、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说的“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都表达了对这种思想的崇尚。

当今世界，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不同类型的民族。在各种国家中，有社会制度、发展程度不同之分，有规模大小、国力强弱之别；在各种民族中，有人口数量、经济文化水平不同之分，有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之别。因此，要始终倡导国家不分强弱、民族不分大小，都应一律平等相待、和平共处，这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和促进各国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是极为重要的。中拉人民曾长期经受外来侵略和殖民之苦痛，深知和平相处之可贵，都应一如既往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把同舟共济、和平共处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继续贡献智慧和力量。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我们“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五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主张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必须相符合相统一的一种思想智慧。所谓实事求是，是说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相统一，在实践中检验一切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认识、政策、措施、办法，坚持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规律的真理，修正脱离客观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这样才能不断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概念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书中评价刘德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和人民所倡导的“求真务实，不尚空谈”“言行一致，躬行实践”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与时俱进是实事求是精神的本质要求和内在体现。客观实际和社会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实际变化了、实践发展了，人们的认识以及要采取的政策、措施、办法也应随之相应变化和发展，否则就会同变化和发展了的实际与实践相脱节，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在中国历史上，与时俱进的思想也是源远流长和深入人心的。中国历史典籍中所倡导的“因时达变，与时偕行”“推陈出新，革故鼎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主张，都体现了这一思想。

当今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新事物层出不穷，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给各国的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要解决好这些新课题，努力运用好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是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相反，如果故步自封、因循守旧，那是没有发展出路和光明前途的。

六是天人合一，俭约自守。这是关于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勤俭与奢华关系的一种思想智慧。

所谓“天人合一，俭约自守”，是说人与自然界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协调平衡状态，为此，人们应该节俭朴素、力戒生活的奢华，防止过度地向大自然索取，以免造成对大自然自身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平衡的破坏。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应该服从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同时，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完全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社会服务。但是，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应该合理有序、俭约有度，如果过度滥用和浪费自然资源，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等脍炙人口的警句，都表达和强调了珍惜和节约自然资源、力戒奢华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治家治国的极端重要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就，但与此同时，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应该到了反躬自问的时候了：今天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是不是严重失衡了？我们是不是从自然那里索取得太多了？如果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无限地膨胀下去，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在遭到严重毁坏而失衡以后，会给人类自身带来怎样的恶果？一切关心地球命运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应该高度关切并严肃回答这些问题。毫无疑问，认真借取和积极践行天人合一、俭约自守的思想，对于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各位朋友，我和国际儒联的同人们不远万里来到拉美，是抱着向拉美文明和拉美朋友虚心学习的态度而来的。相信我们的这次学习会是鼓舞而来，满载而归。

站在秘鲁首都利马的这个论坛上，我们不能不想到秘鲁人民在中拉关系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从1849年第一批中国人来到卡亚俄港到今天，秘鲁的华人已经有300万，几乎占到了秘鲁人口的十分之一。在秘鲁当地人民的帮助和支持下，他们很好地融入了秘鲁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彼此之间建立了深挚的友好情谊。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秘鲁人远赴中国，致力于中秘友好和经贸文化交流，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最近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国会演讲时提到的秘鲁汉学家和翻译家吉叶墨先生，他自1979年至1991年在中国南京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西班牙语，编撰了《来自中国的报道》《李白诗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等著作，还在中国出演了包括《大决战》《重庆谈判》等25部中国电影，受到中国观众喜爱。可以相信，中秘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随着岁月的延伸，将越来越深厚绵长。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对莅临本次会议的秘鲁前总统加西亚博士为发展中秘、中拉关系所做的突出贡献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赞赏。他已经九次访华，不但对中国古老的历史和文化饶有兴趣，而且不遗余力地推动中秘两国的友好合作。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中国与秘鲁间的贸易额增长了两倍，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秘鲁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加西亚博士在卸任总统职务后，对包括中秘、中拉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继续进行深入的思考，并根据他对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从东西方历史文化比较的角度，回答了当今困惑人们的种种问题，完成了《儒学与全球化》一书的撰写。他的这部大作已经被译成中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我在这里要向加西亚博士表